

奉贤文史资料



(18)

奉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八日

一、沉痛地回忆——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朝鲜排华惨案真相

蒋文鹤

二、褚家聚的战斗

毕文懿 俞顺芳

三、旧事两则

蒋文狮

沉 痛 地 回 忆

——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朝鲜排华惨案真相

蒋文鹤

朝鲜，韩国（以前统称朝鲜），与我国东北接壤，又与山东隔水相望，是一衣带水、唇齿相依的亲密兄弟之邦。1895年4月17日，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日本帝国占有了朝鲜之后，两国关系就发生了相反的变化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日本帝国主义者消灭，始得恢复正常关系。追溯往事，不难看到，帝国主义图谋侵吞中国的野心，是何等的凶狠、毒辣。而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，又何等地腐败、软弱和无能。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才能救中国。

一、日本的处心积虑。日本是一个蕞尔小国，土地仅43700平方公里。1930年时，人口只有8500万人，粮食恐慌、资源贫乏，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，而称霸世界。乃按照田中奏摺的阴谋，侵略邻国，实施它的南进与北进的移民政策。其南进政策：以台湾为根据地，向我国东南沿海各省、东南亚各国、以及澳洲一带入侵。北进政策：以朝鲜为根据地，向我东北三省入侵。这三省地处朝鲜接壤，土地有65000平方公里，人口只有2800万人（据1930年统计）。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梦想侵吞中国的一个最好的桥头堡。由于南洋与澳洲等地，属英、美殖民者的势力范围，实力强大，一时难以入手，于是积极推行它的北进政策，加紧侵略我满蒙各地。它的侵略伎俩，除直接移民我东北外，并采用日、朝、满逐步递移办法：即将日本人先移殖到朝鲜，并驱使朝鲜人移殖我东北。而日本驻东北军警，又常庇纵朝鲜人，使之与我中国人挑衅，滋生事端，藉以借口进兵，占据我东北。日本帝国主义者用这种阴谋，图谋侵吞我中国，其处心积虑，已非一日。

二、万宝山惨案的起因。日本帝国主义者，在1894年中日战争之

后，无日不在向我东北积极推行其殖民政策，除直接移殖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东北外，更驱迫其铁蹄下的朝鲜人民进入我东北，与我国人民杂居垦殖。这样，一方面可以腾出朝鲜土地，让日本人占领移民，另方面，又可以增殖其势力于中国东北，为其将来侵吞中国，作好准备。其用尽心机，手段至为毒辣。据1930年调查，朝鲜人在辽宁省租田种植者，约在15万人以上，土地面积约200万亩。在吉林省约30万人，土地约400万亩。在黑龙江省约五六万人，土地约15万亩。总之，当时东北三省的江河沿岸及铁路地带，无不有移殖来的朝鲜人，在租地种植。他们凭藉日本人的威势，拖欠租金的有，霸占田地的也有，为非作歹，不一而足，以致中国人与朝鲜人间的诉讼交涉，平均每年约在千百件以上。受日本政府的庇袒，朝鲜人就日益凶顽，喧宾夺主，时有仇杀案件发生。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安下的朝鲜排华惨案的导火线。

1931年4月，朝鲜人申永均、崔金朴等30人，假托中国人郝永德的名义，向吉林省长龙县政府，请求租垦县属万宝山（龙家屯）处荒地约500亩，希望准其批租10年。县长县政府不予批准。另分函各该管区，以申永均等擅自招集朝鲜人400余人，在万宝山附近华人地方，挖掘水沟，引通伊通河水，长30余里，宽达4丈，毁我农田400余亩。不仅如此，又建筑八旗，修筑河流，侵占流沿岸低地，华农田地2000余亩，尽成泽国。并挖取粮食，欺压华农交粮，乃于同年6月25日，向龙县政府提出严重抗议。并群起质问朝鲜人，请其填平水沟。然不但无果，反遭该地武装日警开枪射击。我国农民六死三伤。初点，乃于7月2日晨7时许，进行填沟平渠，以地日警开枪射击。当场打死我徒手农民多人，同时又捕去十五六人，竟将他们严刑虐待，设词反诬、诬称华农暴动、殴杀鲜人。日方甚至调集军警、大肆捕人和搜缴华农自卫枪枝，并占领我万宝山、马哨口等地，挖掘战壕，架设机枪大炮，埋放地雷，向我挑战。

三、朝鲜排华惨案。万宝山惨案发生后，日本帝国主义者即趁

机授意朝鲜各地的日朝各报馆，每日出版号外或特刊数次，专事捏造谣言，危词耸听。不是说中国政府，将于8月1日之前，一律驱逐朝鲜人出境；就是说中国官民围攻万宝山、三姓堡等处的朝鲜人等等。他们竭尽混淆、煽动之能事，挑拨华人与朝鲜人之间的恶感和矛盾，鼓动朝鲜人进行排华暴动，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煽动、唆使下，一般不明真相的朝鲜人，信以为真，燃起了憎恨中国人的错误心理，遂聚众暴动，向我在朝鲜各地的华侨，猛烈攻击。日本浪人及日本部分军警，乘此也变装改服，混在朝鲜人的暴徒队伍中，参加劫杀、抢掠。

1930年秋，我从国民党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交际科，调任驻朝鲜总领事馆代副领事。1931年春，调任驻仁川办事处领事銜主任。当时有些情况，是我亲眼目睹、亲身经历的。其凄惨情况，悲愤之心，实难以笔墨赘述。

此次暴行遍及全朝鲜各地，平壤城（即汉城）、仁川、釜山、汉川、镇西浦、新义州、安东、开城、元山、宣川、公州、清州、蔚山、光州、木浦、海州、新原等地，凡是有华侨的地方，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一安排、唆使之下，有组织地惨杀华侨，抢掠、焚烧华侨商店和房屋等件。在朝鲜各地惨案，为时持续达四五月之久。华侨被害达数千之多。财产损失达三亿元（当时估计）之巨，所有地亩房屋，被劫掠一空，即遭抢掠一空，无一幸免。惨死惨伤，尸骸枕藉，哭声遍野，惨不忍睹，实为国际历史上空前的悲剧案。

上述各城市暴动，以平壤、仁川、平壤三地最为惨重，元山、釜山、宣川等，亦很严重。平壤方面，朝鲜人于4月3日晚间，有组织地分队出发，将城外华侨店铺全部捣毁。4日，又将城内华侨住宅捣毁100余家，惨死惨伤200余人，5日造为星期日，各校学生竟也加入暴动。此一日，被捣毁、抢掠最为严重，华侨死伤300余人。

平壤华侨受害最为惨重。4日晚间，朝鲜暴徒开始向华侨商店、

住宅袭击，至5日上午，陆续增至数千人，手持武器，进行大规模的烧杀、抢劫。新旧两市街的华侨住宅、店铺300余家，无一幸免。据事后逃出的侨胞报告，被残杀的华侨达210余人，受轻伤者约有500余人，不知下落者尚不计其数。

1931年7月3日上午，仁川亦开始有朝鲜人暴动，当时我接商会电话报告，在外里地方发生朝鲜暴徒，向华侨商店抢劫。我立即电告仁川日本警察署，请其严行禁止，并负责保护。紧接着我即通知华侨商会会长傅绍禹，火速召集所有青壮年男侨民，紧急集合，作好一切必要准备，全力保卫华侨、华商集中地中国街。午后风声紧急，我偕同商会会长傅绍禹、亲至仁川日本警察署，提出两点要求：1、请其严加防备、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；2、请其立即禁止报纸恶意宣传、挑拨煽动。通回办事处后，接着又电告汉城中国总领事馆总领事张维城，转请日本驻朝鲜总督府，制止仁川的暴行。不意日韩当局，一意孤行，置若罔闻。报纸仍不遗余力地刊出号外，激烈宣传反华，朝鲜人亦到处散发传单，聚众开会。至晚8时，朝鲜人聚集2000余人，大举暴动，遇我侨民，即行乱击。除中国街以外，所有侨民商店以及侨民经营的菜园，全部被暴徒捣毁，侨民受伤颇多。翌日，侨民纷纷向中国街避迁，我见形势更为凶险，乃又偕同商会会长傅绍禹，赴日本驻仁川警察署，要求出动武装弹压；一面再次电请总领事向日本总督府要求，加派军警保护侨民。仁川警察署署长表示，时我侨民的生命财产，担负完全责任。总督府亦允加派武警50名。午后2时，总领事张维城亲自表到仁川，我将韩人暴动情况，向总领事作了详细汇报，并陪同他到仁川日本警察署，要其切实负责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。该署长点头应允。事后知道，此次朝鲜排华惨案，实际上乃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一手制造的，是幕后的阴谋策划者。所以我们向日本提出的要求，它仅是敷衍了事。

是晚8时，朝鲜人愈聚愈多，暴动随着愈演愈烈。速不得已，我在9时许，再次乘车赴警察署交涉。该署长回答说，他们的警察

人少，力量单薄，爱莫能助。在无可奈何下，我随同张总领事赶回汉城总领事馆。次日晨，约见日总督府外事课长和日本驻朝鲜政务总监，进行紧急交涉，表示中国的严正立场，强烈要求对暴动立即弹压制止。迨我匆匆赶回仁川时，侨民们已束手无策，坐以待毙。我深感弱国无外交，有负侨民的殷切期望，不禁愧愤交加，热泪盈眶。

暴徒除向中国街进攻未能得逞外，其余各处，所遭横暴情况，惨不忍睹。同生泰等84家华侨商店门窗，俱被打破，货物器具，毁弃、抢掠殆尽。侨农的菜园30余处，亦全数被毁。侨民被击毙者3人，受重伤者数人，伤重而不至死者数十人。当时由仁川商会收容的男女难民，有2000余人之多。

四、平壤灾情调查。此次朝鲜排华惨案，受害最为严重的，除汉城、仁川之外，以平壤最为惨烈。7月8日上午，我奉总领事张维城之命，参与由总领事馆委派魏锡赓、郑维芬以及汉城各报社记者组成的平壤灾情调查慰问团，于当日傍晚，搭火车赴平壤，次日晨抵达车站后，即有日本道厅人员森山及警员森尾、日本报社记者以及朝鲜人民团体代表20余人，名为欢迎，实质把我们调查团包围，不让与外界接触。彼此招呼后，即步出车站。我们本想自己雇出租汽车，直接奔赴平壤华侨避难所，慰问被害难民，询问被害详情。那知日本道厅人员强拉我们，乘坐他们早已预泰好的汽车，护送至平壤饭店。森山说了种种危言，并装腔作势，含泪表示他们如何地爱护华侨，束后还告诫我们，不可自由行动，见遭不测。调查团魏副领事接着严正地说，他们未来之前，已向贵国总督府外事课长及警务局长问明此地情况，郑说此地已平静无事，可以前往，所以我们奉上级命令前来的。此行使命，只是安抚侨民，以及视察和调查侨民被害情况而已，别无其他。我们此次抱了牺牲生命的决心而敢于来的，所以不怕暴徒对我们的袭击。要是他们真约杀害我们，那倒可以让暴行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他们一再的用言语阻拦和恫吓，我

们坚决表示，无论如何，非先去华侨难民收容所慰问难民不可。森山对我们的坚定态度，无法应付，只得回道厅，请示道知事。他们没有理由拒绝我们的要求，仍由森山与我们同往收容所。

正在这时，有平安南道事务官主事柳本前来，他说：此次贵国在留诸君（指我国侨民），无故受此灾害，非常遗憾，但是收容等事，均由道厅及府厅，并日韩民众之同情救济，现已平安无事。在平壤的华侨5200余人，都已收容在医学讲堂内，很安全。我们连日来，日以继夜地不睡也不休息，克尽保护之责。魏副领事说：我们是慰问而来的，我们见见被难侨民。他却要我们稍待片刻，须请示上级官长许可，方准相见。当日人去打电话请示时，适有一家朝鲜报社记者，趁日人去打电话空隙，入室来访。据他说：此次不幸事件，并非朝鲜人的主谋。据他调查，平壤所有华侨商铺500余家，都被暴徒捣毁，抢掠一空，无一幸免。被杀害致死的有男71人、女12人，重伤的男64人、女9人，轻伤的男33人、女6人。记者言犹未尽，听得日人打电话回来，即慌张告别。

在得到许可后，我们就同日警等乘汽车赴收容所，车到收容所附近，但见日本武装军警，戒备森严，车到门前，只见院内无数被害男女难胞老幼，破头、瞎眼、折臂、断腿，为数不少，蓬头垢脸，衣不遮体，血污满面的不计其数，其惨目不忍睹。难胞们一见我们，如见亲人一般，女难胞们抢先上来，有的拉住我们的手和衣服，有的抱住我们的身体，孩子们甚至抱住我们的腿，嚎啕大哭，男难胞也一起放声大哭。旋由日警把我们一行引至一室，却不见侨胞中有敢来谈话的，我们要求会见灾民中的商会负责人及国民党的同志。日人不得已，方始将商会会长孟宪诗等十人，派遣汉语的日警送表，但见孟会长已被打得脸青鼻肿，衣衫破碎，形同乞丐。我们大家先则相视默然，继则相抱大哭，泣不成声。稍后，我们先说明是奉张总领事及商余总会长、党部委员之命，前表慰问难胞，调查暴行真相与侨胞被害情况的，以备作请求政府向日方交涉的资料。乃

请孟会长止泣，作扼要的情况介绍。

据云：7月3日晚9时，即有众多朝鲜青年人大起暴动，手持长棍、短刀、石块、砖头等，遇华侨即毒打、刺、杀。遇华侨住宅、商店，即焚掠、捣毁。其中有吹哨下令者，有喊口号鼓动者，华侨遇之，非死即伤，无一幸免。现在被日警送来此处者（指华侨避难所）约有5000多人，被暴徒打、杀而致死者，不下200多人，不知下落者，不计其数。有的甚至被剖腹挖心，肝肠流籍在地，虽嗷嗷待哺的婴幼儿，亦所不免。孟会长说，我等在朝鲜数十年，从未得罪过一个朝鲜人，不知何故？他们竟凶狠毒辣到如此地步！当暴动初起时，有少数好心的朝鲜人，准备把我们隐藏起来，可是日警不允许。他们也不允许我们携带财物，而把我们空身强送至此，在露天受苦。谈至此，日警不准他继续再讲，孟等又放声大哭，不敢再说。此时有一日警持枪逼难胞后退，魏副领事怒而问他：你干什么？日警说怕他们暴动。魏团长说有我担承，岂会有暴动之理。日警方始后退。我们向难胞慰问再三，依依惜别。临行时，孟宪诗会长像小孩离开父母一样，拉住魏团长的手不放，此时所有难民，又一次放声大哭，闻者无不伤心落泪。

我们一行来到医院，其状更惨。被打伤的难胞，都躺在地板上，一间小屋内，一人靠一人，躺五六人不等，重伤奄奄待毙者有70多人，属病危者20多人。此外，被打断手脚、打出眼珠、打破头、打断鼻梁骨的有10多人。遍体鳞伤者有200多人，具遭刀伤斧劈，呻吟呼号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真是天不佑人，我侨胞何其如此之苦呀！出医院，我们又到街面察看，但免凡是华商大小店铺，不论饭馆、伙食铺，甚至连理发店内的所有货物，全部被抢劫一空，房屋俱被捣毁。最后我们要去察看尸体，日警却领我们到平壤俱乐部，送来西菜。我们都说，这是个什么时候？岂是来俱乐部吃西菜的时刻！道知事说：如果去的话，那太危险了，难恐保护不了。团长说：你们保护不了，我们自己去，倘被暴徒打死，我们亦无所畏惧。他们免没

法拦阻，方叫来汽车，派日警陪同我们一块去。行数里停车，看到有的新坟已经草草筑成，尚有尸体90余具，堆放一处，正在仓卒掩埋。我们向死者行了三鞠躬，致哀并摄影，凄然而返。

我们调查结果认为：此次朝鲜排华大惨案，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，有计划地恶毒宣传，挑拨和唆使无知的朝鲜人民演成的，其惨害情况，为亘古所未有。随调查团归来，返回仁川办事处，痛定思痛，侨胞受难惨状，犹在脑海中回萦，无法忘却，至今回忆，印象尚深，真是此恨刻骨铭心也。

不数日，接总领事馆通知，将愿回国的难胞造册，与其他地方的难胞万余人，一并遣回本国安东安置。如有愿回原籍者，发给差旅费转当地安排。日韩当局欺骗舆论，派外事科长送来“救济金”表示“慰问”。总领事张维城不仅予以拒收，相反向对方提出强烈抗议：要求惩凶、赔偿和道歉。朝鲜排华大惨案，在国际舆论压力和交涉下，为时半月，始告平息。

褚家聚的战斗

毕文懿 俞顺芳

褚家聚（现塘外乡政府所在地）在我县东南，濒临杭州湾，离青村镇约3公里。地处偏僻。群众主要以晒盐为生，在开垦不久的盐碱地上种些玉米、高粱、绿豆等杂粮。长期来，褚家聚人民遭受国民党政府海匪盐霸的残酷剥削和欺压，生活十分贫苦。解放初期，黄志明残匪还盘踞于此，为非作歹，造谣破坏，扰乱民心，与人民政府对抗，群众疑虑重重。

1949年7月24日，十二级台风夹着暴雨袭去我县，靠近大海的褚家聚首当其冲，受灾更是严重，刚出土的绿豆、荞麦幼苗，被暴风雨洗劫一光，广大群众情绪悲观，处于绝望之中。县人民政府，为了消除群众顾虑，积极抗灾，一面组织力量深入群众，宣传党的

方针政策，号召受灾人民，树立信心，自力更生，生产自救，战胜自然灾害，一面派出人员外出购买绿豆种子，发给受灾群众，号召及时补种。

那时，我们在第六区（即青村区）乡镇联合办事处工作，区委书记李少峰同志组织全体干部下乡，深入基层，了解灾情，发放种子及救济粮，区委组织课长刘长发带领我们在褚家聚工作，为了防止残匪骚扰和保证安全，我们住在褚家聚盐务所驻军一起，住房简陋，两扇大门，下用木板，上用几根木条钉成，一根木棍作门闩，大门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天井，象凹字形的三间小屋，正中是战士宿舍，一个20岁左右的班长带着11位比他还年轻、个子矮小的小战士，保卫着整个盐场的安全，其中有三、四个战士患有疟疾，因少医缺药，没有治愈，每天发病。宿舍西侧一间，放着三、四支陈旧的三八式步枪和一挺机枪。西侧的另一间是给我们使用，里面只能搁两张竹榻，一张课桌。我们就在这间小屋子里给群众开票发粮、发种子。人员来往嘈杂，土匪乘机混入解众，窥探了我们的武器实力，到第二天晚上12点钟左右，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浦东支队”支队长黄志明的20多个武装匪特包围了盐务所，几个土匪爬上大门叫喊“开门支枪”。机灵勇敢的战士，全部迅速地板离宿舍，占领有利射击位置。我们三人，只有刘长发同志有一支六寸小手枪，我们两个女同志是赤手空拳，老刘同志知道我们没有参加过战斗，令我们挨墙脚就地伏倒，躲避流弹，并叮嘱要注视动静，万一门被击破，就迅速跟随他冲出包围圈。他自己手握手枪守住房间，我们两个伏在墙根，手里捏着垫床脚的砖头，当作武器，时刻准备着突围。土匪不断地大声叫喊，多次爬墙撞门，都被战士们的机枪赶了下去。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，土匪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，遂对准战士的宿舍，连扔二枚手榴弹，屋顶被他们开了“天窗”，有几个土匪爬上屋顶，被我机枪手一个点射，全部滚下屋顶。我们虽然人少武器陈旧，但以少胜多，击退了成倍土匪配有长枪、短枪、冲锋枪、手

榴弹的轮番围攻。二个小时的战斗，土匪没有损伤我们一根毫毛。他们却怕我们的区中队闻声前来增援，就灰溜溜地跑了。

东方发白，周围群众闻讯纷纷前来慰问，见我们安然无恙，都欢笑庆贺。群众怕我们撤走，离开他们，每天来我们住处探望，有时我们到青村去开去，他们围住我们询问：“你们去青村港还来不来？”我们坚定地回答他们：“我们不走，散会后马上回来，和你们一起，消灭土匪，斗倒地主，分土地，搞生产，我们要一直住下去。”他们见我们说到做到，消除了顾虑，渐渐跟我们接近起来，发现可疑的人，及时向我们报告。播下的种子，获得了好收成，他们手捧收获的绿豆向我们报喜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年农民笑盈盈地说：

“过去的政府，只是伸手向我们要钱要粮，从来没有人关心穷人的死活；今年遭到少见的灾难，茫茫白地却还能得到收成，人民政府真是我们穷人的政府，今后我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，跟毛主席走。”

那个作恶多端的匪首黄志明，1951年4月被我军警捕获，同月20日依法判处黄犯死刑立即执行，正是大快人心。

旧事两则

蒋文狮

（一）国民党的“国大”代表和“立法”委员选举

国民党施政，分成三个时期：一是军政时期，从北伐开始，到夺取政权，全国统一为止。第二个时期，是训政时期。主要进行党政军的各种调训。全国各省市县，设立了中央训练团、庐山军事训练团、省有干部训练团、党务训练班。县有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，大量调训各级党务、军事和行政干部，为蒋家王朝的党国收买、为巩固它的政权行下基础。1947年，蒋介石想政法袁世凯，他当然清楚，做直帝是不可能的，那末就圆一下做大总统的梦，所以不顾人民的反时，一意孤行地宣传进入第三个时期——宪政时期。召开

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”，选举大总统、副总统，制订新宪法，他这样做，美其名曰“还政于民”。于是在同年8月，本县也在上级规定下，成立了《国大代表、立法委员奉贤县选举事务所》，由奚永之县长兼主任，陈士良任总干事，蒋文狮任选务科长，孙瑞棠任总务科长。

按规定“国大”代表，每县产生一人，其余代表，以及“立法”委员名额，则按选区及人民团体会员人数，作为选举人名额多少而产生。所以有的在一个选区内，只能产生一人，如一个以上，就不是一县产生一个了。选举事务所首先的主要工作，赶造选民名册。为了争取选民人数多，暗下指标各人民团体，把原来不是会员的，只要与团体有些关系的人，也造进会员名册。各乡镇人民，则按户口册满16足岁的人数计算，到时按人名填写选举票。

同年9月，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，在镇江召开各县选务科长会议，除了在会上分发了不少有关选举的文件以外，还由该厅负责人，讲了一大套选举的重要意义，选举的进行程序，以及注意事项。会议结束前，由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训话，中午会议结束后，王懋功在镇江永安酒楼，设西餐招待各县出席会议人员，以及有关人士。傍晚，凡是竞选“立法”委员的，苏州私营苏轮纱厂的董事长姓严的（名字已忘记），在苏州市北局银行公会楼上，设宴招待各县出席会议人员。下一天中午，我又应邀赴我中学时老校长，当时的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社会处处长钮长耀家中去吃饭，因为他的妻子要求在奉贤县妇女会中投上她一票。在选举投票前一个星期，南汇县浦建公司创始人王昆仲，国民党三青团上海市团主任，松江县人吴绍澍，都于同一天来到奉贤，假座南桥镇沈家花园底楼大礼堂（即现县政府小礼堂）宴请奉贤县有关人士。王吴两人作竞选立法委员演说。何尚时虽然没有人与他竞选，他当然也讲了一套，说如果当选后，如何为国为民效劳的话。选举投票柜分设在各乡镇公所、县教育余、县商会及县工会等十多个地方，选票都是用红纸印的。

绝大多数是由所在地的机关工作人员，把内定的候选人，写上他的姓名、几十张、几十张地塞进票柜了事，所以等选举揭晓，当选人都是些早已内定的人物。何尚时是本县的大地主，曾任国民党奉贤县党部监察委员，临时参议会议长，所以没有人能与他竞选。不过话也得说回来，何尚时在选举之前，与县党部书记长陶家麟，县长奚永之，来往非常密切，请客与送礼的次数也不少，当时，这是公开的秘密。

总之，国民党的选举，无非是一场闹剧，做做样子，谁不知道，手里有钞票，上面有后台，那末委谁出来，谁就可以粉墨登场，谈不到什么民意、民主。何尚时、吴绍澍、王昆仲、钮长耀的妻子等的当选，是早已内定了的，人民群众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选举？不认识谁是候选人，选举现场没有选民，选票箱内的选票，都是当局玩的把戏，是戏剧产生的角色。

(二)一个新的积谷仓的得来

抗日战争前后，曾任国民党奉贤县警察大队分队长的南桥镇人朱文鱼，在朱贤县沦陷后，当起了汪伪暂编十三师的警卫团长，驻扎在上海县北桥镇。骚扰、搜刮当地人民，可以说作恶多端，当地人民恨之入骨。国民党奉贤县长奚永之是上海县马桥镇人，所以对朱文鱼的所作所为，十分清楚。奚在1946年4月到位后，即在同早夏末秋初，将朱文鱼逮捕，关押在协和弄（现解放路）朱贤县军法看守所内。有一天，奚永之派人到我家来说，有事请我去见他（当时我在县党部供职）。奚永之说，我听说你和朱文熙、朱文鱼两弟兄是老亲戚，早时感情很好，所以请你帮忙，为公家做一件好事。我问什么事？奚说，奉贤县以前虽有一个积谷仓，在公共场所前门泥城里，抗日战争初起，被日本飞机丢炸弹塌毁了，你是知道的，现在县政府筹集了一些钱，想到无锡去买一批稻谷，以防饥荒，可是没有堆放的地方。既要买稻谷，必须先要有相当容量的空房子，而且委水路方便，又不能陈旧。他接着说，据有人告诉我，朱文鱼前

一个时间，在东街市梢横泾滩上，买有五间平房，作为积谷仓用，非常合式。朱文鱼这座房子，是在做汉奸时，用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，所以我今天特地请你来，劳驾你去对朱文鱼说，就说是我请你向他转达我的话，叫他把这座房子捐赠给县政府，改作仓库，如果他答应的话，近日内马上把他释放。要是不答应，就随他的便。我说，我去说一下，当然可以，不过成不成，我不能肯定。次日上午，我到军法看守所找到姓黄的所长，叫朱文鱼来到办公室，把奚永之的话告诉他，朱文鱼想了想对我说，我是愿意的，不过馥仙（朱文鱼的妻子）是否愿意，我不知道，请你去问问。当然丈夫在坐牢，用一座五开间的房子去赎回来，也不在乎这些，所以也一口答应，就这样，一个新的积谷仓，不化一文钱而得来了。